

第一辑

禅文化 下

黄夏年 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辑

文化 下

夏年
主编



禅宗历史



达摩与梁武帝的历史性会面

(美国) 冯克强

有关达摩的生平，在禅宗典籍中存在着两个相互矛盾的故事。根据道宣所著《续高僧传》中达摩传记及其他相关信息，说达摩于刘宋末期抵达中国南部，时在 478 年或更早，最后来到北魏。这则传记，成文于 645 年至 665 年间，其中还提及达摩的两个弟子，即道育和慧可。道育，又称道副，被认为与《续高僧传》中所记的僧副是同一个人。达摩传记还显示，达摩曾四处游化，但不知道他最终归寂何处。

另外一个故事，见于 13 世纪的《五灯会元》一书。此书称禅宗初祖于梁普通七年（526）抵达中国南部，不久即抵南京覬见梁武帝。与武帝的会面简短且不成功，达摩于是离开南京北上来到嵩山，在少林寺附近山上的一个岩洞中壁观。根据此书记载，达摩最终在千圣寺圆寂。有关千圣寺，其他典籍中并无记载。《五灯会元》中没有提供达摩圆寂的具体时间。这个故事与前面所述的故事有所不同，却是大家普遍接受的一个版本。

学者们同意，有关达摩生平的第一个故事的可信度更高，原因在于《续高僧传》成书于达摩身后一百三十年左右的时间，远

远早于其他典籍。另外，此书中有其他僧人的传记也为达摩的故事提供了佐证。然而，虽然此书在推测达摩生平方面是最可信的信息来源，但是有关达摩 494 年以后的生平并没有提供可靠的证据。有些学者认为，达摩圆寂于 494 年或之后不久，《续高僧传》之后的一些典籍也是这样记载的。但是根据《续高僧传》中有关禅宗二祖慧可生平的传记，大家普遍认为达摩是在洛阳地区圆寂的，时间在北魏 534 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之前。《续高僧传》慧可传记显示，达摩圆寂之后，二祖慧可继续光大师傅的传法事业，僧俗从者如流。我们从中仍然无法获知达摩圆寂的准确时间。有些禅宗学者根据《续高僧传》推测达摩圆寂的时间应在 530 年左右。《续高僧传》以后的一些历史记录则称达摩圆寂时间要晚于 530 年，这其中就包括梁武帝纪念达摩的碑文，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具体讨论。

禅宗历来极为重视达摩见梁武帝的传说。这个故事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达摩禅与当时佛教界流行观点和做法的差异。《续高僧传》中有不少段落对达摩的教义进行了描述。其中一段讲到，达摩强调“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与之不同的是，梁武帝重视佛教经卷及义学研究，重视度僧、造寺写经以积累功德。达摩倡导后人为其总结的“直指人心”宗旨，与梁武帝倡导的佛教信仰和修行方式，两者相较，立分高下。

因为梁武帝直到 502 年才建立了梁朝，禅宗普遍接受达摩是在梁武帝称帝后才来到东土的说法。尽管时间上与最可信的《续高僧传》记载有冲突，这个说法仍然为大多数人所采信。问题是，如果达摩在洛阳地区生活并于 494 年或之后圆寂的话，他怎么可能与 502 年才登基称帝、素有“菩萨皇帝”之称的梁武帝相见呢？更何况梁朝都城与洛阳嵩山相距甚远。

一、达摩抵达中国后早年的情况

有关达摩到达中国的时间，虽然没有直接的记载，但学者们普遍认为应该在 479 年之前。《续高僧传》称，达摩于刘宋朝（420 ~ 479）抵达中国南部。《洛阳伽蓝记》一书中记载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说有一个法号菩提达摩的僧人见到此书作者杨衒之时自称已有一百五十岁高龄，时在 516 年至 528 年间。对于这个故事，笔者暂且放在一边不予讨论。我们先在此假设达摩最可信的圆寂时间是在 534 年，如果他活了一百岁并于三十岁时抵达中国的话，则他抵达中国的时间应该在 464 年。如果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话，他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汉语、与更早来到中国的求那跋陀罗（468 年圆寂）见面并在南部中国旅行。如果达摩圆寂于 528 年（某些证据是如此显示的），假设他活了一百岁并于 464 年抵达中国的话，则抵达中国时他的年龄是三十六岁。因此，达摩最早于 460 年抵达中国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当然，达摩到底活了多长时间并无定论，以上也仅仅是推测而已。不过，这一切都显示达摩于 460 年抵达中国是可能的。

如果达摩于 460 年抵达中国的话，他可能见到过当时居住在刘宋都城南京并于 468 年圆寂的印度佛教学者求那跋陀罗。这一观点可以在《续高僧传》中找到部分解释，该书记载达摩曾使用由求那跋陀罗翻译成汉语的《楞伽经》。另外，净觉于 708 年所著的《楞伽师资记》一书将求那跋陀罗置于中国禅宗“北宗”传承系统的第一位（初祖），达摩则被列为求那跋陀罗的法嗣。虽然《楞伽师资记》并没有明确说明达摩与求那跋陀罗见过面，但指出早期北宗僧人是将这两位来自印度的祖师作为承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两位祖师以下则开创了作为中国禅宗主流的东山法门，但求那跋陀罗并没有被列为中国禅宗的初祖。一位东山法门僧人法如（681 年圆寂）的塔铭则显示菩提达摩被尊为中国禅宗

的初祖。

僧人慧皎于417年所著的《高僧传》（道宣所著晚于此书故称《续高僧传》）中记载了求那跋陀罗在中国的生平。他于435年前后抵达中国，受到刘宋皇帝及贵族的推崇，翻译经书数部并先后在南京、徐州等地弘法。当时，谯王义宣得遇求那跋陀罗，支持其弘法，十年间一直供养他并保持书信往来。后来，谯王阴谋反叛朝廷，被孝武帝镇压。孝武帝怀疑求那跋陀罗参与谯王谋反，但对两人来往书信调查后发现，求那跋陀罗并没有卷入其中，对他的怀疑也消除了。之后求那跋陀罗继续弘法直至468年圆寂。假如达摩464年或更早来到中国的话，他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在求那跋陀罗圆寂之前与其见面的。如果他们真的有机会见面，求那跋陀罗应该会将他曾面临的政治险情告知达摩，以免达摩卷入统治阶层的纷争之中。达摩对北魏和南梁皇室的一贯（疏离）态度也许正是由此形成的。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推测，但如果要解开达摩为何避免与帝王或高级贵族接触这个谜团，这种推测就像猜谜游戏的一块拼板一样，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

《续高僧传》的作者道宣（596~667）是7世纪的一位名僧。他综合律宗各种不同支派的教义并加以系统化，最终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的“南山”律宗。642年后他住在唐朝都城长安，协助著名的玄奘翻译后者从印度取回的瑜伽宗经典。642~665年间道宣编写了《续高僧传》，该书收集编撰了自500年前后至道宣所生活的年代的名僧传记。慧皎所编撰的《高僧传》成书于517年，因此道宣将自己的著作视为《高僧传》一书的续集，名之为《续高僧传》。道宣本人不是禅宗僧人，因此学者们认为他对禅宗僧人的评价与禅宗僧人自己内部所记载的禅宗历史相比更为客观。

道宣在《续高僧传》中收集编撰了当时佛教各宗派僧人，包括禅宗僧人的传记。在禅宗僧人传记的后面，道宣编写了有关禅宗的附录。在附录中，道宣表达了他对当时那个历史阶段禅宗的

观点，并较详细地论述了禅宗的历史，提出了一些评论。其中道宣还描述了禅宗大受欢迎的盛况以及著名禅师的情况。对于达摩广为人知的传教活动，道宣是这样记载的：“属有菩提达摩者，神化居宗，阐导江洛”，“大乘壁观，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在《续高僧传》的另外一个章节有关僧人法冲的传记中，道宣也提到了达摩，“于后达磨禅师传之南北”。从这些记述和其他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达摩的影响还波及长江流域地区。中国学者胡适指出，达摩到达洛阳之前在中国南部逗留的时间很短；他认为达摩为了广为传法而需要时间学习汉语，但北上来到黄河流域之前达摩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然而，如果达摩在洛阳地区生活一段时间后没有返回南方的话，胡适博士所得出的结论就与前面提到的《续高僧传》中的说法（“神化居宗，阐导江洛”）相矛盾了。假如达摩于460年前后抵达中国，他应该有足够的时间与求那跋陀罗见面、学会说流利的汉语，并开始在长江流域传法，然后才北渡至洛阳。但是，我们没有记录证明以上事情真正发生过。在缺乏明确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对达摩这个时期的活动做出任何结论。我们掌握的事实仅仅是达摩的徒弟们在洛阳地区跟从他学法，在抵达洛阳之前达摩可能并没有太多的传法活动。

在《续高僧传》有关禅宗的附录中，道宣有一句让人浮想联翩的话，他称达摩“帝网之所不拘，爱见莫之能引”。这句话给我们描绘出达摩生平的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尽管传说达摩曾与梁武帝短暂会面，但没有记录显示达摩曾主动寻求与皇家或朝廷建立联系。达摩似乎视朝廷为传法事业的一大威胁。他是当时的一个著名禅师，一个“阐导江洛”的僧人，他不像其他外来的僧人一样去巴结讨好中国皇帝。他的行为与极力博取梁武帝支持的僧伽婆罗（495~524年间居华）和波罗末陀（又名真谛，546年来华，569年圆寂）等外来僧人形成鲜明对比。

二、达摩在洛阳地区的活动（485～497）

虽然《续高僧传》称达摩禅法广为流传，但传记只是告诉我们485至495年间（为期五至十年）达摩传法的区域而已。在此期间，我们知道达摩在洛阳地区收了几个徒弟。《续高僧传》在有关达摩年龄最大的徒弟僧副的传记中，称僧副于齐建武年间（494～497）离开洛阳地区前往南京。在同一篇传记中，说僧副在南京开善寺圆寂，时在524年。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僧副于494年至497年间离开洛阳去南京时的年龄大概是三十一岁。在此基础上反推可知僧副在达摩座下学法时的年龄应该是二十多岁。

《续高僧传》对达摩另一位名声更大的徒弟慧可所作的记载，引发人们对其年龄和不同时期活动地点的疑问。《续高僧传》和之后的书籍记载显示慧可见到达摩时已有四十岁。杨笑天博士指出，成书于708年的《楞伽师资记》称慧可与达摩见面时只有十四岁。杨认为《续高僧传》误将慧可的年龄十四岁颠倒过来认为是四十岁，之后的一些书籍沿用了这种错误记载。除了这个错误外，《楞伽师资记》中有关慧可年龄的其他记载是正确的。以此为基础，杨认为慧可见到达摩的时间是490年，当时年龄是十四岁。杨进一步推断，慧可圆寂的时间是582年，时年一百零七岁。以上的时间推断是符合人类寿命时限的，对慧可生平来说也是可信的。假如慧可于490年见到达摩时年龄为四十岁，按传统的说法于592年圆寂，他就活到了一百四十岁。虽然许多禅师活到了高龄，但这仍然是不太可能的。杨博士的论断很有价值。根据《续高僧传》的记载，慧可约于490年初次见到达摩，在其座下学法五年。

因为达摩于490年至494年间在北魏洛阳地区授徒传法并最终在此地圆寂，多数学者认为达摩494年之后没有离开过。但

是，笔者认为，鉴于达摩“……阐导江洛”及类似的历史记录，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证据做更深入的研究。

杨笑天博士提出，达摩和其一众弟子很可能于494年或之后不久离开了洛阳地区。这种推断是以古籍记载和众所周知的历史证据为基础的。他指出，据《续高僧传》记载，达摩的教义当时曾受到激烈的抨击。杨笑天指出，对达摩激烈的抨击很可能来自那些支持研习各种佛经及义学的僧团。

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他捐资修建了云冈及龙门佛教石窟，敕建禅宗寺院（包括嵩山少林寺），主持佛教僧人间的义学辩论。中国学者汤用彤（1893～1964）在其重要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提供的大量证据显示，基于佛教不同译本及解释的义学纷争在达摩在世时期是广泛存在的。互相竞争的各种派别之间的矛盾有时是很尖锐的。杨笑天在有关义学纷争方面也提供了一些证据。某些派别为了在朝廷为本派争得更高的地位而抨击其他派别的观点、捍卫本派的学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是在这种喧嚣的纷争中，达摩在嵩山、洛阳地区度过了486年至495年这段为期十年的光阴。

杨笑天博士指出，494年发生的一件大事可能令达摩及其弟子猝然决定离开洛阳地区。那一年，北魏将都城由北方的平城南迁至黄河边的古都洛阳。孝文帝将朝廷突然间转移到离达摩生活传教地相距不远的地方，同时南来洛阳的还有朝廷尊崇的高级僧人。其中包括帝师道登、平城的佛教领袖僧义、著名番僧佛陀（朝廷曾专为其建造寺院）以及其他对达摩教义持反对态度的高级僧侣。孝文帝热衷于佛教义学，他组织僧团以支持和传播佛经研究。汤用彤摘录了一则朝廷的敕令，即《令诸州众僧安居讲说诏》，内容是这样的：“可敕诸州令此夏安居请众，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数处讲说。皆僧祈粟供备。”

此外，北魏一朝曾有佛教僧人反抗朝廷的宗教统治，由僧人领导的起义频频发生。历有473年起义、481年起义和490年起

义。490年的起义发生不久，孝文帝就将都城由平城南迁至洛阳。这些起义都打着宗教的旗号，宣称他们代表着真正的佛法。490年宗教起义的为首者是僧人司马惠御，他“自称圣王”，起义最终被残忍地镇压了，司马惠御本人也被当局处死。皇帝及佛教高层自然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再次发生，那些朝廷无法控制且弟子众多的僧人肯定被视为危险人物。当朝廷决定将都城由平城迁至洛阳时，很多对达摩教义持反对意见或意欲加害他的人也一起来到达摩居住的地区。这种情况与《续高僧传》中达摩曾遭受到众多非议的记载是一致的。杨笑天认为这种紧张的气氛是达摩决定离开洛阳的原因之一。杨的这种判断是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的。

《续高僧传》为达摩弟子之一的僧副写有传记。传记称，僧副籍贯太原，曾“游无远近，裹粮寻师访所不逮。有达摩禅师，善明观行，循扰岩穴，言问深博，遂从而出家，义无再问一贯怀抱，寻端极绪为定学宗焉”。

让我们注意一点，僧副传称他“循扰岩穴”寻访到达摩祖师。在此期间（约486~490），少林寺尚未创建。然而，少林寺所在的嵩山早就是中国的“中岳”名山了。在嵩山范围内，当时已建有数座重要的佛教寺庙和道观，其中包括法王寺和会善寺，而且两寺当时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嵩山之中山峰林立，沟壑纵横。少林寺创建之前的十年，达摩可能已经开始在现在众人皆知的“达摩洞”中面壁观心和授徒了。今天的“达摩洞”，距少林寺（始建于497）约一英里，是一个位于半山腰处的岩洞，现在被隐士当做居所使用。这种岩洞对那个时代来华传教的外国圣人而言也许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那么少林寺的开工建设是否导致了达摩及其弟子离开此地呢？杨笑天博士指出，如果达摩于486年抵达嵩山，于495年离开的话，这段时间正好与禅宗有关达摩在嵩山洞中面壁九年的传说相吻合。

《续高僧传》所记载的达摩弟子僧副的生平，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有关达摩及其弟子们活动（路线）的线索，而这些线索是很

吊人胃口的。该记载称，南齐朝建武年间僧副离开洛阳地区，来到南京住了下来，当时南京叫杨辇，是齐朝的都城。他因为喜欢有林有湖的环境，在位于都城东北郊的钟山下定林寺住了下来。让人惊奇的是，僧副所居住的钟山与齐朝皇宫，也就是502年后梁武帝萧衍的南梁皇宫之间十分接近。《续高僧传》清楚地显示，达摩大弟子在一座与皇宫只有几千米之遥的寺院中安顿下来。

《续高僧传》还记载了有关达摩弟子僧副和梁武帝的其他有趣的信息。据《续高僧传》载，僧副作为一个僧人，生活十分简朴，“三衣六物外无盈长”。这种简朴的生活为僧副赢得了包括梁武帝在内的梁朝皇室的一致称颂。记载称梁武帝曾邀请僧副到宫中说法，但被僧副坚决地拒绝了。从僧副拒绝入宫之中，我们是否看到了他师傅达摩一向拒绝与朝廷接触的态度在他身上的影响呢？此外，僧副拒绝入宫觐见梁武帝一事，似乎反而提升了他的声誉。据记载，梁武帝在开善寺内特别为僧副准备了住处供他使用。僧副最终于524年在此圆寂。同一篇文章中记载，梁武帝得知僧副圆寂的消息后十分悲痛，给达摩的这位弟子追赠了许多礼物。梁武帝最年长的孩子永兴公主一向对僧副有归信之意，得知僧副去世的消息后，永兴公主专门到东宫请太子为她写一篇归信僧副的文章并在东宫当众朗诵。

让我们对《续高僧传》中纷杂纠结的记载做更细致的考察。记载为我们描绘了达摩的大弟子与梁武帝所居之处近在咫尺。记载告诉我们梁武帝十分敬信僧副；僧副圆寂之后，梁武帝及整个皇室都表现出对他的无比尊敬。记载显示，僧副在钟山度过了他一生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497～524年，近二十七年），然而，虽然梁武帝的皇宫与僧副所居寺院只有咫尺之遥，但僧副拒绝入宫觐见武帝。事实上，梁武帝的太城殿就在钟山脚下目光可及之处。

读到这些记载，我们禁不住会有许多疑问，但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僧副为什么不去太城殿拜访（梁武

帝)? 其次,除了令人尊敬的简朴生活之外,僧副还有什么能使得梁武帝对他如此推崇有加?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些重要问题,我们应该首先对梁武帝及其朝代的历史做个简明的了解。

梁武帝,名萧衍,于502年成功推翻齐朝皇帝萧宝卷(499~501年在位)建立梁朝。萧宝卷生活奢靡,对忠诚的大臣及平民滥杀无辜。十几岁的他性情多变,阴险狡诈,通过手段镇压了三次大规模的起义,但最终被萧衍击败。萧衍作为贵族,在对抗北魏的战争中屡建军功,后率领一群对齐朝廷不满的官员,通过巧妙的心理战和军事行动将暴君萧宝卷赶下皇位。

在萧衍登上皇位后的头十年时间里,他逐渐接触到佛教,天监(502~519)中期,他开始吃素,远离女色。登基以后不久,梁武帝即开始新建佛教寺院,一方面是为死去的父母追福,另一方面在帝国范围内弘扬佛法。造寺规模巨大,十分耗费国力。武帝供养很多佛教僧人,并定期与僧人一起研究佛理、研习经文。他本人还亲自撰写经文注疏,在钟山上的寺院中举办大型授戒法会。武帝的长子,即昭明太子熟读佛教及儒教经典。太子所居的东宫,经常被武帝用来招待高层僧人,听高僧说法。就在东宫中,当时的许多名僧为武帝讲解佛教教义,昭明都一起参与其中。

519年梁武帝正式“出家”,在一次大型法会上受菩萨戒。梁武帝对佛教的虔诚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当时,法会是在华林宫后花园举行的,参加法会的人数多达“四万八千人”,法会上武帝与其他贵族信徒一起受戒。据历史记载,武帝以这种方式“出家”至少有两次。每次武帝“出家”之后,朝廷都被迫捐出大笔钱财把武帝“赎”回来请他继续做皇帝,所捐的钱都用来建造佛寺。据称,武帝本人居住在宫中后院的一间没有家具的简单房屋中,在铺着一领草席的地上就寝,时间大多花在研习经文上。

位于太城宫内的“东宫”,在当时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为了给宫廷提供娱乐,高级僧侣及文人在此聚会,各界饱学之士

说玄“清谈”，梁武帝和太子不仅邀请本土名僧，还欢迎外来的僧人来东宫聚会。《梁书》记载，萧统不仅迷信并皈依佛教，他还是名僧“清谈”活动的组织者。“太子亦崇信三宝，遍览众经。乃于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谈论不绝。”

太城宫正是萧统，即后世所称的昭明太子举办各种活动的场所。《梁书》记载，这个年轻人不幸于531年离世，时年仅三十岁。他收集历代传世的诗歌编成十二卷诗集，共分一百多类，并编写了注疏。这就是人们所知的《昭明太子文集》，被后世称为中国首部诗歌文集和文学评论集。梁武帝和昭明太子收集了数千卷文学和佛教典籍，建成了一个庞大的图书馆。萧统本人还研究创作诗文，其存世作品仍有很多篇。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年轻的太子还为经文撰写注疏。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萧统成为一个当时文坛的重要人物。他因病于531年离世后，据《梁书》记载，悲痛欲绝的父亲说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恶。”

梁武帝自502年至549年在位，在其多年的统治期间，佛教与朝廷间关系之密切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与其相比的。萧衍被称作“菩萨皇帝”，他经常召集大批贵族和老百姓到同泰寺及钟山上专门建造的说法台，亲自为大家讲解佛经。他本人也对佛经做注疏并在公开场合宣讲。

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达摩的大弟子竟然拒绝来太城宫拜访，真是太令人称奇了。当其他名僧趋之若鹜、不惧千里之遥前来拜访梁武帝时，有人竟以这种方式拒绝宫廷的邀请，实乃惊人之举。另一方面，僧副并非一个从不与大众接触的消极遁世者。《续高僧传》记载显示，大众将其奉为道德楷模而大加推崇。另外，他曾应武帝之兄长侯之邀前往远离南京的四川。僧副离开南京来到四川，在此居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居川期间，僧副曾游历峨眉山，据说创立了四川禅宗。此后他又回到了南京。

在众多高僧入宫拜见的情况下，梁武帝为什么对一位从不踏进皇宫半步的僧人给予特殊的尊崇呢？此前我们已经就达摩本人

对注重义学研究的统治阶层避而远之的态度进行了分析，似乎达摩的大弟子基于同样的原因对宫廷采取了和师傅同样的态度。

三、494 ~ 524 年间达摩的行踪

对 494 年后达摩行踪有直接记载的早期书籍，只有 547 年前后杨衒之编著的《洛阳伽蓝记》。这部书直观形象地记述了洛阳佛教寺院的盛况；成书时已是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的战争之后十年的事了，这些寺院在战争中几乎全部被夷为平地。杨衒之撰写此书原意可能是对耗费巨资兴建佛寺之举进行鞭挞，但此书同时也是对孝文帝迁都之后都城洛阳的繁华景象的一种纪念。

杨衒之书中描述的第一座寺院就是永宁寺，该寺紧邻北魏皇宫，是一座宏大的地标性建筑。对该寺院的宏伟富丽进行一番描述后，该书引用了一位来自西域、名为菩提达摩的僧人的话对寺院大加赞叹。引用的话是这样的：“‘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

杨笑天博士认为，《洛阳伽蓝记》中述及的这位名为菩提达摩的僧人也许与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并非是同一个人。杨笑天及其他专家指出，此书有关菩提达摩的记载存在一些与历史不一致的地方。《洛阳伽蓝记》称这位僧人来自“西域”。虽然“西域”一词亦可包括印度南部地区（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即来自此地），但不大可能以这种方式描述达摩的出处。另外，一位拍着巴掌口唱“南无”不止的僧人也不大可能与一向强调“观心”法门的僧人是同一个人。因此，杨笑天认为，《洛阳伽蓝记》中的这位僧人只是一位名字也叫菩提达摩的僧人而已。笔者更进一步认为，杨衒之在事过境迁许多年之后对此事的记述，似有捏造事实之嫌。这段话听上去更像是对永宁寺的宏伟壮丽所做的添油加醋的描述，而这个所谓的故事也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续高僧传》

的作者道宣还曾撰写过一本《广弘明集》。《广弘明集》中有关杨衒之的传记，称杨衒之对佛教是怀有敌意的。综合以上及其他原因，笔者同意杨笑天博士的观点，即《洛阳伽蓝记》所记载的这位菩提达摩并非历史上著名的达摩祖师。

杨笑天认为，《洛阳伽蓝记》中所记载的菩提达摩，是另外一位法号菩提达摩、又叫“嵩头陀”的僧人。杨指出，有记载显示“嵩头陀”曾由嵩山南下，渡过长江到达中国南部；达摩祖师“一苇渡江”的传说也许正是因此附会而起的。

笔者此文所引用的很多素材取自杨笑天的文章，但杨文并未论及达摩 494 年是否携众弟子离开洛阳南下至中国南部及南京一事。笔者拟就此进行讨论。

四、达摩与金陵（南京）

本文此前已就达摩及其弟子欲远离洛阳的原因进行了论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朝廷及佛教界的反对意见甚至迫害，如果达摩不远离北魏朝廷，这一切都不可避免。不管达摩与求那跋陀罗是否见过面，但后者在华传教的经历可能为前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即外来僧人最好远离政治。道宣在《续高僧传》中曾提及达摩“阐导江洛”、“帝网之所不拘”，因此可以推断，达摩是力图远离公众视线的，至少在他曾传教说法已建立声望的地方。

那么，494 年的这次长途旅行对达摩而言是不是年龄太老而无法成行呢？如果达摩生于 434 年，那么与弟子们一起离开洛阳时，他已经是六十岁了。如果南行路上需要长途跋涉的话，六十岁的他应该还是能够应付的。在古代，徒步远行是很平常的事。虽然中国古代的僧侣常常徒步行脚，但乘坐牛车也是可能的选择。当然，达摩也很有可能是乘船南下的。

有一种可能，495 年前后，达摩的大弟子僧副独自南下，而

达摩和慧可则去了其他地方。在中国北部省份河北的成安县，当地传说称有达摩和慧可来此传法的地方——“说法台”。然而，由于缺乏更确切的证据，这仅限于猜测而已。

不管达摩和慧可是否曾到过北方，一些实物及文献证据显示达摩、慧可和僧副最终都来到了南京地区。实物证据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实物证据就是长江。杨博士的文章认为，达摩极有可能是渡过长江继而南下的。虽然步行南下也是有可能的，但以船代步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其他证据证明，达摩、慧可和僧副在南京地区逗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下面我们先来研究一下文学证据。

学者们指出，大多数“实物证据”是无法作为可信的历史指针的，这个说法当然是正确的。对著名的宗教人物而言，更是如此。不管是都灵发现的耶稣裹尸布还是其他遗物，与宗教人物有关的人造品以及实物证据往往不可采信。然而，有些实物证据还是有价值的，可以作为古籍记载的补充。以古籍记载作为研究的基础，我们可以发现实物证据或者可以作为古籍的佐证，或者与古籍记载的相矛盾，或者与古籍记载的故事完全融汇在一起。

494至498年间，北魏与南齐之间发生战争。如果当时达摩和他的弟子们穿过战争前线进入南齐界，那么他们肯定会找到一个北魏当局无法追踪到的地方。如果说他们就是这样由北魏来到南齐的，是否讲得通呢？

达摩之前的两个世纪里，中原汉人就一直在由北向南进行大规模的迁徙，在长江河谷定居下来。其中一条主要迁徙路线，是从洛阳直接向南经过伏牛山进入长江的主要支流汉江。沿着汉江及其支流，迁徙的汉民可以乘船顺流而下直抵长江。对达摩和他的弟子们而言，乘船顺流而下抵达南京应该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整个水系可用于人员和货物运输。作为托钵化缘的僧人，如果达摩和弟子决心南下的话，这一小众行人是不太可能碰到大障碍的。由水路一路南下是一种可能，全程步行也是可能的一种